

65年前,我们跟着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

近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组负责人、南大历史系老师武黎嵩给《发现》周刊打来电话,讲述了65年前秋天的一场离别——1949年10月,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440名学生从下关中山码头离开南京,作为西南服务团的一分子,随二野刘邓大军开赴西南。整个西南服务团有一万七千人,除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一千多名学生参团。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总共有3000多人,南京是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地,也是出发地。

一年前,南京大学西南服务团口述历史项目组一行11人,去云南省昆明市寻访了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21名老校友。65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身在何处?那段历史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在江苏省档案馆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如今在南京生活的几位老服务团人。



今年国庆期间,定居南京的原西南服务团战友聚会纪念进军大西南65周年。前排左二为陈宝荣、右一为丁品,后排左三为汪作民,左四为蔡秉三。

邓小平在中大操场上作报告 题目叫《论老实》

从1949年7月下旬到9月底,西南服务团集中在南京学习。二野的领导同志先后向服务团人员作报告。后期还进行了军训。

讲述人:汪作民

生于1931年,南京人,在南京一中读高三时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后编入云南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先后在昆明、宜良、弥勒、开远等地学习、工作。1979年9月调回南京。离休前在南京市广播电视局工作。

我1949年7月16日入伍,报到地点是察哈尔路的原中大附中。

8月1日,我和战友们穿上了新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布胸章,打裹腿,穿着黑力士鞋。我们一大队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南京各大学的学生,少数是中学生。每个班有十二人左右,女生只有两三人。个别还是地下党、团员。

8月28日是开学礼。地点在三牌楼的原国民政府行政院(今解放军政治学院)。刘伯承给我们讲话。

随后我们在南京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形势和政治理论学习。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在中央大学操场上作了《论老实》的报告,一上台他就说:“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老实……”他要求大家做到对党老实,对人民群众老实,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学习。第一次作报告时遇到防空警报,中断了,第二天继续讲完。

邓小平坐着吉普车来,穿士兵的短袖短裤军衣,只带了几名警卫员。作报告时,他手上没有稿子,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很多同学围着他要求签名留念,他也一一签名,还亲切地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于10月21日从北京赶到郑州部署大西南战役。此前一天,二野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运动。

“少爷兵”步行三千多里 走完“小长征”来到大西南

西南服务团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开赴大西南。云南支队跨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七省,于1950年2、3月间胜利抵达云南。川南支队则经贵州后,于1949年底、1950年初到达四川。

讲述人:丁品

生于1928年,宜兴人,21岁在镇江工大学团学习时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后编入川南支队六大队二中队。入川后在泸县七区人民政府工作。1960年调西藏工作。1980年调回南京,离休前任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们从中山码头乘轮渡到浦口,坐上拉牛拉煤的敞篷车(也有人坐闷罐车),

沿津浦铁路出发。一个车皮内塞进一百余人。人们分成两排,各自头靠车厢,两边脚对脚。紧团的车门只留一小条缝,男同志小便可以对门缝方便一下,女同志就麻烦了。男女同志之间放上行军锅、油桶、粮袋之类当屏障。

1949年10月6日,也就是当年的中秋节,火车停在郑州。10月10日到达汉口,住在英商太古公司二楼的大仓库里面,休整三天,领发冬装被服。

等继续南下到湖南岳阳就没有铁路了,坐木船横渡洞庭湖到益阳。过了洞庭湖开始步行,10月27日到达桃源。11月5日,我们川南支队随五兵团从桃源向川南进发,山区整日阴雨连绵。我们冒雨前行,每天路程少则五六十华里,最多达一百华里。

服务团。入滇后被分配到云南电信部门参加接管工作。1981年调回南京,在南京邮电学院工作。

经过100多天的行军,1950年3月6日,我们到达目的地昆明。我们把这一次行军称为“小长征”,喻为“八千里路云和月”。郑州一位铁路员工说:“二野、四野的大军经过郑州的太多,但总是一到就走,有时连开水都没有,干吞了几块饼干就走,可西南服务团经过这里时,上级总要求给你们做饭吃,照顾你们到街上去玩玩,照顾得无微不至,你们真不愧是‘少爷兵’!”但就是这群“少爷兵”,克服困难,穿越湘黔公路,脚踏云贵高原,跨过崇山峻岭,高呼口号,一路歌声,胜利到达昆明。

行军途中我写了40篇行军日记,行军路线是:南京—汉口—长沙—邵阳—芷江—贵阳—沾益—昆明,全程3512.5公里,其中乘坐火车1903公里,步行1609.5公里。



西南服务团离开南京时经过挹江门



向大西南进军在南京举行誓师大会

巾帼英雄智斗土匪 群众赞她“双枪老太婆”

1950年2月底3月初,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指战员们陆续抵滇,被分配到省会昆明和另外五个地区担任党政机关骨干和各地基层工作队的骨干,与当地干部一起,为军事接管、征粮剿匪、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等作出了贡献,其间,云南支队的同志有86位牺牲。

讲述人:陈宝荣

生于1925年,南京人,24岁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上学时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后被编入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入滇后被分配到云南省武定县第四区汤郎乡工作。1966年回到南京,被分配到街道工作。

我到云南后,被分配到云南省武定县第四区汤郎乡工作,主要工作是征粮。1950年5月的某一天我

听说当地一个警队叛变了,当晚他们要勾结地主武装攻打猫街。我冷静地吩咐大家做好一切应战准备。我们在镇上守了一夜,一夜没有动静,到第二天早上东方发白时,有个民兵在一个狗洞旁听到了敌人的动静,打响了第一枪,战斗也正式开始了。

当时双方力量悬殊,我方就民兵十多人、农会会员30人,再加上我和一个地下党,而敌人有几百人。后来,敌人开始喊口号:“活捉陈宝

荣,赏大洋500元。”后来又涨到800元,但没有一个民兵出卖我。后来敌人开始威胁:“你们再为工作组卖命,就杀掉你们全家,烧掉你们全村。”这些农会会员于是害怕了,他们也没通知我就私自撤走了。幸好居民杨柏志老人来告诉我这件事,所以我只好通知民兵分散突围。

在突围时,遇到一个农会会员在路边等我,让我换了一身彝族的衣服,告诉我前方有敌人埋伏,让我

先到他们村子里避一避。躲了几天后,几名农会会员护送我,逃出了猫街,来到了第三区的高桥,县委书记见到我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正准备为我开追悼会。

县委书记派了两个班的解放军给我,一起把猫街的粮食运了出来。事后专区通报表扬了我,群众见我穿黄军装,打绑腿,身背大枪,手握小枪,还挂着手榴弹,就叫我“双枪老太婆”,其实我左手不会打枪。

背景

一万七千人组成西南服务团,南京参加的有三千多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随后在短时间内迅速解放了江南大片国土。新形势下,党中央电令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但西南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工作,面临着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倡议组建一支集战勤部队和宣传队于一身的地方干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隶属于第二野战军。

1949年6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宣告成立,总团设在南京。由第二野战军副政委、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宋任穷担任总团团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公开招收西南服务团成员的通告,迅速掀起了“解放大西南”的参军热潮,组建了一支由六千多名老区干部和在南京、上海、皖南等地招收的一万多名学员组成的战斗队伍,总计一万七千人。

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以下编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等(前三个支队入四川),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中,除了少数西南籍同志被调到西南服务团川东支队、川南支队外,其余都编入了云南支队。云南支队的第一、四支队(学生队)共有南京学生1400余人,其中中央大学就有372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70%。



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金陵大学学生在出发前留影

口述

1 南京准备

2 二野行路上

3 云南接管

现状

江苏有300多人从西南返回家乡,在南京定居的有40多人

不论是南京大学西南服务团口述历史项目组在云南的寻访,还是此次我们在南京的采访,这群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老人,谈到这段经历,几乎都说到四个字:青春无悔。从1949年10月他们离开南京,在完成了接收云南的任务后,他们

又投入建设云南的任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永远地留在了云南。正如宋任穷评价西南服务团时所说:“不愧是投笔从戎的一代,自我牺牲的一代,无私奉献的一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武黎嵩说,他们筚路蓝

缕、甘于奉献、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缩影。

西南服务团江苏团史研究会会长丁品说,上世纪80年代,西南服务团江苏团史研究会成立,帮助服务团的江苏老同志们落实政策,每年

开一次研究会,邀请在西南的同志回家乡江苏看一看。丁品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人中共有300多人从西南回到家乡江苏,在南京定居的共有40多人,今年国庆期间,为纪念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65周年还在南京举行了小聚会。



有关西南服务团更多内容,请扫码观看视频